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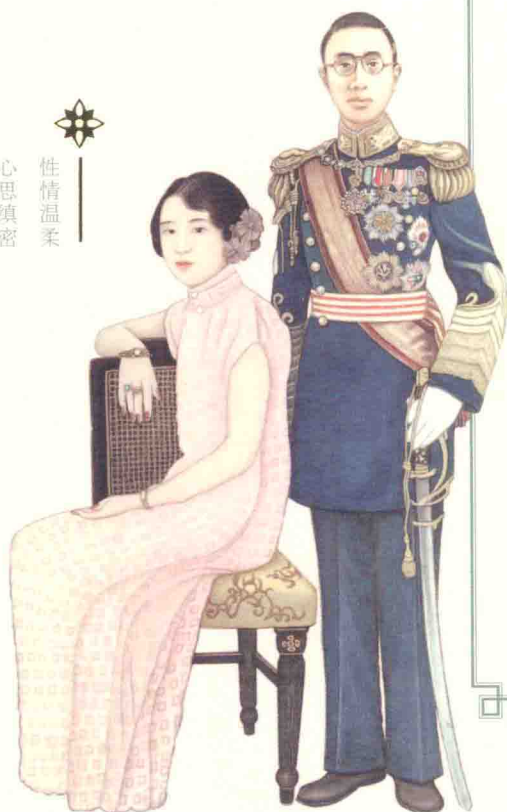
— 末代皇帝的五个女人 —

伪满洲国『明贤贵妃』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谭玉龄 传



性情温柔

心思缜密

她曾是溥仪的清风明月

却终究不是他能留住的

人生慰藉

王庆祥
●
著

一代皇帝的五个女人

伪满洲国『明贤贵妃』

谭玉龄传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王庆祥 ● 一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伪满洲国“明贤贵妃”谭玉龄传 / 王庆祥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5
(末代皇帝的五个女人)

ISBN 978 - 7 - 02 - 010837 - 4

I. ①伪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谭玉龄(1920~1942)—传记 IV. ①K 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57849 号

责任编辑 陈 旻 于 壮

特约策划 李江华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芑 屹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0 千字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9.75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 - 7 - 02 - 010837 - 4

定 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譚玉齡像

当谭玉龄由北京来到长春和我见了面，彼此都同意结婚之后，也遭到了植田谦吉的干涉，干涉的理由是，必须由他先派吉冈安直赴北京到谭家作详细调查，认为“合格”之后，经过植田的正式许可才行。结果是在“令出如山倒”的情势下，经吉冈赴北京调查认为“合格”并和植田见了一面之后，才允许我们结婚的。

——爱新觉罗·溥仪

自序

谭玉龄二十二年的一生太短暂。她与溥仪婚后的五年，亦即这位年轻女性的最后岁月，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关东军对溥仪严密、巧妙的控制，反映出虚伪宝座上的傀儡皇帝的种种心态。她的处境，是其背后的政治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。

在溥仪前半生所拥有的四位后妃中，惟谭玉龄的处境最能说明日本人羽翼之下的溥仪的傀儡地位。婉容作为皇后，在后宫地位最高，从小朝廷大婚起到伪满结束，与溥仪共同生活的时间也最长，但因早在伪满初年，溥仪与婉容的感情就已经破裂，以后的漫长生活里，他们各自起居，且婉容身处冷宫，形同软禁，两人之间早已没有一致的思想了。文绣与溥仪共同经历了在北京当“关门皇帝”和在天津当寓公的岁月，但不待溥仪跨入伪满的门坎，文绣已坚决地自请下堂。李玉琴在伪满临近垮台的一刻也才十七岁，尚未成年，虽与溥仪也有过恩爱的“宫中生活”，毕竟难得有深层次的共同语言。

出身旗人家庭的谭玉龄，在她十七岁时的妙龄年代，带着满族贵族家庭的遗风，从北京出关来到溥仪身边。她有娇美的容貌和温柔的性格，给绑在日本军阀战车上的“康德皇帝”送来几许温暖、几丝柔情。正值一九三七年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时刻，这位在北京上过中学的女学生，也曾以朴素的爱国思想感染溥仪。当然，她也是听得到溥仪私房话的少数几人中的一个，两人的感情因而深化，更加甜美。她亲身体验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政治审查，



而她的悲惨之死，也成关乎政治的千古之谜。溥仪与谭玉龄悲欢同步的五年虽已逝去，溥仪对谭玉龄的怀念却永恒地保存了下来。

谭玉龄去世时太年轻，且距今已经久远，寻觅她的生平资料太难了。但凭本文粗线条的勾勒，读者也可以看到关东军的凶残面貌以及傀儡皇帝的可悲可怜。

目 录

自序	001
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出“关”入“宫”

一 闯关钻套的“猴帝王”	001
二 魔爪伸进帝王家	007
三 私传“密旨”让岳母选妃	015
四 植田谦吉批准的“贵人”	018

第二章 伪满的“宫廷生活”

一 养在宫中的“鸟儿”	024
二 “皇帝”与“贵人”的感情生活	027
三 女伴眼中的“贵人”	033
四 嵯峨浩眼中的“贵人”	037
五 奶妈和女仆眼中的“贵人”	041
六 “内廷学生”眼中的“贵人”	043
七 随侍眼中的“贵人”	048
八 “大不敬”事件始末	051
九 给未来的儿子先填卖身契	053
十 无可排遣的苦闷	057



十一 “皇后”和“贵人”	059
十二 生离死别的凄惨一幕	063

第三章 “贵人”之死

一 谭玉龄是被害死的吗?	066
二 溥仪决定为“贵人”隆重举丧	075
三 “吉安所祭祀”	078
四 “暂安所祭祀”	085
五 真挚而深切的怀念	091

第四章 千古一谜

一 遗体火化	096
二 疑案重提——“毒死贵妃的传说的真相”	099
三 谭玉龄留给丈夫的纪念品	107
四 历史之谜有新解	111
五 溥仪、李淑贤与谭玉龄将并骨	121

谭玉龄生平年表	132
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一 与谭玉龄史事相关的日记	14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二 溥仪与宗教	142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三 毓岳来信	145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出“关”入“宫”

一 闯关钻套的“猴帝王”

溥仪“闯关东”的本意是要拿着皇帝的身份，借助日本的武力，以恢复大清的江山。不料他陷进圈套，成了东洋武士手中的玩偶，成了一只被戏耍的猴子。

在白山黑水遍地燃烧抗日烽火年代，溥仪由伪满执政而成为“康德皇帝”，官当得愈来愈大，事管得愈来愈少。据溥仪一九五八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写的自传^①记载，伪满初年，各部大臣或其他官员入宫“陛见”，尚无太多的限制，后来情况就变了，“帝室御用挂”吉冈安直瞪着眼睛站在“皇宫”大门口上，除了允许“总理大臣”和“参议府议长”每周依例入宫报告毫无实质内容的“政情”外，不让任何人进门。溥仪作为皇帝的公务，也只剩下例行的“正式接见”、出席“特任式”或种种“典礼”，以及在伪国务院和伪参议府通过的法令上“裁可”了。

伪满组织机构是这样的：国务院内设总务厅，掌管伪国务总理大臣的职务和实行有关政务。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和伪满各部次长，定期于星期二开会，称为“火曜会议”，关东军的代表——第四课长也出席，在这个会议

^① 溥仪 1958 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自传，有刻蜡版油印本存世。



身着伪满陆军大礼服的“康德皇帝”（摄于1934年溥仪第三次“登极”之后）



由溥仪“裁可”的伪满文件

上决定伪满的一切政策法规。呈送到溥仪面前的政策、法令，都是在伪满总务厅长主持的“火曜会议”上议决并秘呈关东军批准后，再经伪满国务院和参议府付诸形式上的讨论和通过才形成的，溥仪只能画“可”，而不得反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溥仪渐渐懒得再到勤民楼去办公，整个上午都在缉熙楼睡懒觉，一觉醒来，便坐在卫生间的“恭桶”上画“可”，“差不多连内容都可以不必去看，并且也无须去看，因为看也等于白费工夫和徒劳自己的眼睛”^①，画完随手一扔，再由随侍一张一张从地上拾起。

这种“办公”方式显然是溥仪不甘心受人摆布的消极反映，其实溥仪也曾经试探性地为掌握主权而积极地行动过。一九三二年八月，趁着关东军司令官换届的机会，胡嗣瑗给溥仪出主意，让他向新上任的武藤信义建议缩减

^① 引自溥仪 1958 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自传（油印本）。

署照准

照像

休議

家

臨

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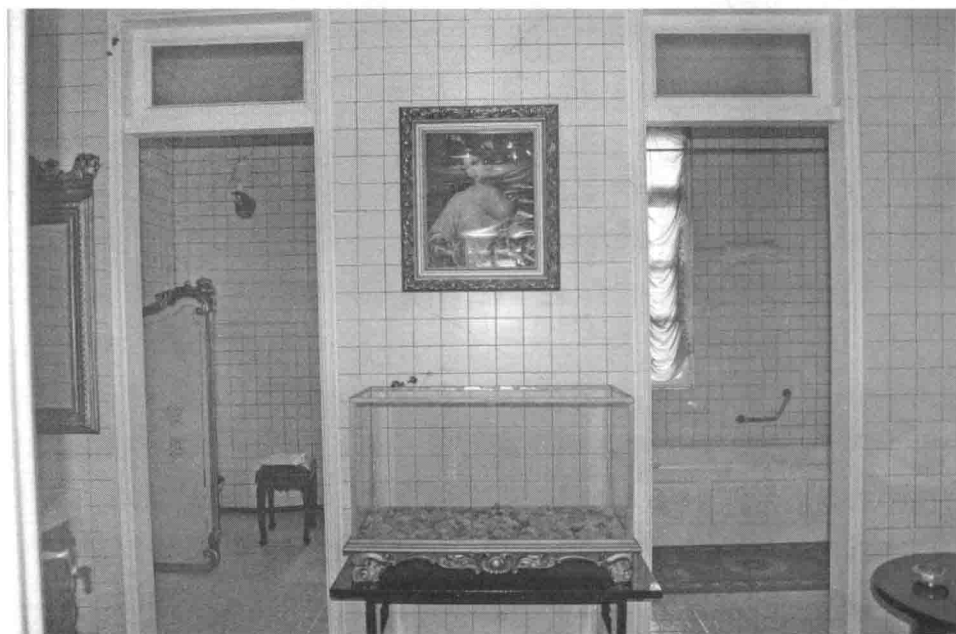
留覽

明子仙譜

可

北平西園德堂

“康德皇帝”亲笔“裁可”留迹



缉熙楼内溥仪“坐马桶批奏折”的卫生间



虚假的“办公影像”

总务厅长的政治权限，以使伪满各部大臣得以负责办理各自部务。溥仪照办了，当面讲过之后又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武藤。结果，胡嗣瑗被调离溥仪身边。溥仪这位高参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出任伪满执政府秘书长的，一九三三年调任有位无权的参议府参议，至一九三九年被免职，由溥仪供养其全家，直到伪满垮台。溥仪提议后，总务厅长的权限不但没有缩减，反而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机构改革时扩大了，改总务厅长为总务长官，原系国务总理大臣直属部下，今为国务院总理大臣的惟一辅佐者，有权代行院务，实际已是监督和统辖伪满各部及各地方官厅的握有最高实权的人物。

身为“皇帝”的溥仪，不仅对此无能为力，还要接受作为伪满太上皇的关东军司令官赤裸裸的当好傀儡的教育。他们告诫溥仪说，“满洲国”实行“总理负责”的政治制度（实际是伪总务厅长或伪总务长官负责的制度），“皇帝”应取“高高在上，垂拱无为”的态度，不要干涉或驳改“国务院”和“参议府”业已通过的议案或法令（实际是“火曜会议”通过的议案或法令），这正是“培养君德”的地方。



同德殿一楼便见室，溥仪经常在此会见关东军司令官。

溥仪在其自传中也曾举出伪满年代第三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为例：

有一次他对我讲，愈是“身为人上”的人，便愈应保有“装聋作哑”的雅量才行，能这样也才能做到“无为而治”的地步。说到这儿，他还做了实际表演：以双手做蔽目、掩耳的姿势，并说他身为“三军司令”的关东军司令官，就一贯采取这种不闻不问、听之任之的态度，所以其部下才有放手去干和负责去干的积极工作作风。然后他又把话归入本题，以教训的口吻强调说：“皇帝更应该采取这种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态度，才能把国家大事搞好。”他还自作结语说：“这就是为君之德，也就是身为皇帝所必须具有的最高政治道德和品质。”^①

① 引自溥仪 1958 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自传（油印本）。



菱刈隆是日本陆军大将，于一九三三年八月继武藤信义之后，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。他在任期间，一方面把伪满改为帝制，让溥仪当了皇帝，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关东军对溥仪和伪满的控制。

当年的溥仪，不仅作为皇帝没有自由，即使作为个人也是没有自由的，比如例行的会见伪国务总理大臣和参议府议长，要有日籍总务长官在侧，至于会见其他伪满官吏、外国来访者以至官方或非官方日本人，都毫无例外地有人监视。溥仪还怀疑监视者把窃听器装入为他新建的“同德殿”内，而坚决不肯搬进去居住，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。

二 魔爪伸进帝王家

菱刈隆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调回国内就任军事参议官，他还没有离开“新京”（长春），溥仪的“后宫”先出了事。

出了何事？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说，“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”，后来“染上了吸毒（鸦片）的嗜好，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”。早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间，婉容的汉文师傅陈曾寿就听说溥仪已有“废后之意”。陈曾寿是一九三〇年奉召从杭州来天津“进讲”的，一九三一年末护送婉容至旅顺，一九三二年又随往长春，“进讲不辍”。有



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（1871—1952）



了这层关系，才能略知一二，他认为溥仪废后，系由二格格和胡嗣瑗“构陷”所致。当然，他也知道还有进一步的原因，惟“宫禁事秘，莫能详也”。为此，陈曾寿进见溥仪，力请保全婉容的“皇后”地位，“且言今尚未有皇子，选妃事，宜亟办，固不必征后同意也”。溥仪似乎被说动了，他给陈曾寿的答复，一面对婉容“深致不满，而不肯明言何事”，另一面又表示一定保全“皇后”。这当然只是表面的虚与委蛇，其时婉容既忧且惧，连旁观者也认为，溥仪“此机既动，恐终不免耳”^①。

陈曾寿亲身经历的这段史实表明：废“后”与选“妃”从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，溥仪早就立意要召一位新“妃子”入宫了。

当时，溥仪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，“后宫”曝出特



1935年4月溥仪首次访日到达横滨港

^① 参见陈曾寿、陈曾植：《局外局中人记》。